

“高师改大”后国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其特点——以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为例

王金星¹ 王影²

1 江南大学，江苏无锡，214100；

2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安徽省亳州市，236000；

摘要：始于20世纪初的“高师改大”运动拉开了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序幕，国立东南大学在运动中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式，通过文献法、个案分析法研究民国时期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历史特征。研究认为，纵观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师教育发展历史，其课程呈现出科目设置通专平衡，文理兼备；目标追求“学术与实际并重”；质量力求“精益求精”的办学特征。

关键词：高师改大；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

DOI：10.69979/3029-2735.25.2.053

2023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1]5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2]7月25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简称“国优计划”）。从2023年起，国家支持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教适教的学生作为“国优计划”研究生，在第一批试点的三十所高校名单中，南京大学应然入选。^[3]办学始于1912年的南京大学在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历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发端于20世纪二十年代的“高师改大”运动，揭开了国立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培养高水平师资的序章。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代表，“高师改大”运动得到迅速推广，为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时刻培养了大批优秀师资和各科人才。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面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教育的需求成为全体教育者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以南京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再次开启了培养高质量师资的征程。作为南京大学前身的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在百年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教师教育课程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1 文献综述

民国初期，近代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我国教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中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对加速中国教育学科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20世纪初，世界各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教员养成所模式，一种是大学教育学院的模式。陈宝泉与郭秉文执掌的北高师和南高师分别以这两种模式发展，各自取得了辉煌成就。^[5]高师改大运动后，经历了近20年的“定向型”高等师范教育体制，演变成了既含定向，又含非定向的“混合型”高等师范教育体制。^[6]1921年，南高师升格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集结了一批留学美国的教师，培育了一大批教育学科的后备力量。一系列活动使得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名噪一时，成为当时新教育运动的主要发源地。其主要办学特征包括：1）精通专业的师资队伍；2）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3）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7]

抗战爆发后，大学教育学院及教育系重新建立起高师教育制度，定名为师范学院。^[8]其中尤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为代表，在办学过程中，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成绩斐然。^[9]高师改大是一场深受国外师范教育思想变革影响的运动，也是我国师范教育模式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转折点，打破了师范学校在师资培养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实现师范学校和综合大学参与师资培养的开放模式。^[10]在“高师改大”运动中，南、北高师分别选择了“升格为师范大学”和“改建为综合大学”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20至30年代北平师范大学不断陷入办学生存危机，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

由此折射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中动荡曲折的历史。

[11] “升格”后的北师大逐步失去了高师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力。“改建”后的国立东南大学以及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自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以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为保障,以优质的师资队伍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以通专平衡、学实贯通、科教融合为特点。[12]高师改大运动及其论争,对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和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3]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4]

已有研究多从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的办学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探讨其特征和意义。高师改大之后,综合性大学积极参与到教师教育事业中来。从已有研究来看,对高师改大运动之后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态度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派具有综合性的优势,能够培养出通专一体的高质量教师。反对者认为,高师改大运动是对师范教育的破坏,教师缺乏专业知识的教学能力,徒有其表。现有研究较少深入到课程设置。研究从课程设置结构、学分配比、课程培养方案等方面出发,梳理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办教师教育的课程沿革,分析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特征。研究围绕“高师改大后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及特征”这一核心问题,又分为以下具体三个问题:

1. “高师改大”运动的缘起以及南高师是如何成为综合性大学的?

2. 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在不同时期他们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情况如何?

3. 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有哪些特征?

2 “高师改大运动”与国立东南大学

2.1 “高师改大运动”

1914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建立,江谦为第一任校长。1915年,在美留学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受邀在南高师任教;1918年,郭秉文任代理校长,次年正式接替江谦成为南高师第二任校长;“……校长江谦因病离校迄今未愈……查教务主任郭秉文代理校长两年主持校务具有成效亟应正式委任俾专责成至该校校长及教务主任……。” [15]同年,南高师添设教育专修科以培养教师和教育行政人才;陶行知任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1921年,南高师教育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合并为东南大学教育科。郭秉文被任命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校长、前由该校校董会请愿教育部、即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博士兼充、现已

有部批准云。” [16]

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师范大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正在进行改革建立本科师范大学或者并入综合大学。“师范教育的转型实践最早是从国外开始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在国内生产力大发展的刺激下,最先意识到社会在师资养成需求已由数量上的基本要求转变为对教师质量提升的追求。” [17]国内方面,经历了列强侵略的中国,急需教育为国家输送人才,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把学习参考的目光转向了美国,教育界受到实用主义思想影响,“美国最著名之哲学家、教育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杜威氏偕其夫人将于二十九日晚车抵京……此次来华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浙江各专门学堂江浙教育会公聘旋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君电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18]受西方高等师范教育的影响,以郭秉文为代表的留美学者主张将高等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

高师改大构想最早可见于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关于是否改革师范教育引起了讨论。之后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提交“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主张高等师范直接升格为师范大学,为“高师改大”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产出中等学校教员之圆满资格且避设置与经费之困难遂取消高等师范学校而设师范研究科于大学。” [19]“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分为二部甲部三年毕业以副文科副实科及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生如之乙部预科一年毕业本科四年毕业以补习学校三年毕业者入之。” [19]以李建勋为代表的教育学者主张应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师范大学,保留其师范精髓。以郭秉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师资的培养不必局限于师范大学,综合大学学科齐全对培养高质量教师具有诸多优势,主张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学界对于高等师范学校是升格为师范大学还是并入综合大学展开了学术争鸣。

2.2 从南高师到国立东南大学

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的颁布为“高师改大”运动提供了制度基础。《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允许设置单科大学并设有2年制预科和4年制本科。“ (二十一) 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如医科大学校法科大学校之类。(二十二) 大学校修业年限四年至六年……师范大学校修业年限四年(附注四)依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 [20]在学制颁布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已经根据社会形势开展了综合大学改组计划,并于

1921年取得教育部批准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东南大学。“第一章定名第一条本大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第二章校址第二条本大学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一部加以扩充并得设分部于其他事宜地点。”^[21]所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是最早改组为综合大学的高师学校，改革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师范学校提供了经验和仿效对象，“高师改大运动”就此形成。

1929年8月发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教育学院或独立学院教育科，分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及其他各学系，大学或独立学院之有文学院或文科而不设教育学院或者教育科者，得设教育学系于文学院或文科。”^[22]“郭秉文认为若欲办好高师，必须有上乘之师资；欲获上乘之师资，必须‘寓师范于大学’”。^[23]他主张优秀的师资并不一定全都出自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有其独特的综合性优势，其“寓师范于大学”的思想为“高师改大”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支撑。

1920年在校务会议上郭秉文提议在南高基础上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获得委员一致赞同。后郭秉文积极周旋，获得全国教育学界著名学者的联合支持，最终确定国立东南大学发起人名单，包括蔡元培、郭秉文、黄炎培、蒋梦麟、张謇等教育界和实业界人物共十人。郭秉文负责向教育部申请，获得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批准，最后在解决财政经费、校舍选址、学制等难题后，国立东南大学于1921年6月6日正式成立，郭秉文博士兼任东大校长，获教育部批准。1922年6月通过的《南京高等师范归并东南大学办法》规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依照所学科目种类，照新学制归入东南大学各科。’^[24]后经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及校内外教师的努力，1923年7月南高师成功并入东南大学。双校合并后的东南大学系科设置有5科24系，后发展调整为6科31系。

3 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特征

3.1 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3.1.1 国立东南大学时期

东南大学时期教育科课程设置包括必修普通课程、必修专业课程和必修专修课程。教育科下不同科系专业课程要求不同，但都需要学习必修普通课程。从学科涉猎看，必修普通课程包括语言学（英文、国文）、社会学（社会学大意）、生物学、哲学（哲学入门）、体育等科；选修方面开设教育心理学。

在共同必修专修课程方面，教育学科课程占主导地

位，课涵盖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和教育统计。从文理学科划分分析，教育系、心理系、体育系各系科课程设置都兼顾了文理两大学科范畴。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的学生能够修读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等重要基础学科且类别如此广泛，得益于国立东南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拥有齐全的学科门类资源。在学分方面，英语作为必修学科，学分设置为十二分，比国文高了一倍。从学分设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学校对学生体育的重视，体育作为必修课学分设置为六分，与共同必修的“教育通论”课程相当。从课程的学术性与应用型来看，必修课程涵盖社会学、哲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心理学、统计学，而较为缺乏教育实践的实习实践类的课程。这使得培养出的教师有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但也可能存在教学技能与方法上的欠缺。

3.1.2 国立中央大学时期

（一）中央大学前期

1925年易长风潮后，1928年4月，国立东南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较之东南大学教育科时期，规模有所扩展。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在原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基础之上合并江苏省立第四师范附属艺术专修科组建，设教育学系、师资科、艺术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军事教育科。“自心理学系1932年划归教育学院后，该院共设有教育学系；（教育学系一分为三，包括教育心理、教育行政和教育社会学）、心理学系、体育科、卫生教育科、艺术科。修业年限，一律为4年。”^[25]在师资方面，先后任教人数达4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2人。在课程方面，课程数量大量增加，所有科系开设课程总计95门，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理学、体育学、艺术等学科。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升格为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后，课程设置与师资皆有了大幅的改善。其中，教育学系、心理学系变化最为明显。教育学方面，第一，增设了大量教育史相关子学科课程，有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教育心理史以及教育通史。第二，增设教学法、课程设计相关课程，如中学课程、中学普通教学法、

职业教育与指导等实践导向的教学课程。第三，课程设置系统化、体系化。表现为学术课程与实践类课程均衡化、理论类、方法类、教育史类课程丰富化。第四，教育科学化。开设心理学理论类、心理测量等课程，确立了教育研究的实证调查导向。

（二）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按照1938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

师范学院。其课程设置也较之前有所改变，此时的课程设置基本按照教育部办法的《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表》。

1937年到1945年，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央大学也在祖国后方发挥它的重要价值，坚持办学。“课程：根据部颁示范师范学校草案之规定，第一年纪分设共同必修科目及分系专门科目两种，军训、体育及音乐，亦列为共同必修课程，不给学分；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不得毕业。总计第一学年上学期共开十六学程，分三十组；下学期共开17学程，分三十四组。”^[26]按教育部要求，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升格为师范学院，加强师资培养，课程以教育部发布的课程为标准，服务于国家需要。“1938年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和童子军专修科。”^[27]在修学学分方面，教育部亦做了具体的要求，“中央大学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要求学生必须按开课顺序修满136学分以上使得毕业（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略高于此数）”。^[28]

值得注意的是，师范学院在战时设置了童子军专修科和战时培训。“添设体育及童子军专修科，因国内体育及童子军师资缺乏，本院已奉部令核准于本学年添设体育及童子军专修科，拟招收男生三十五名，女生二十名。……增设战时教程，拟请各系教授就可能范围内，增设战时教程，以增加抗战实效。”^[29]1939年，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奉教育部令开设童子军专修科以满足抗战时期培养童子军的需求。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也紧锣密鼓地准备学校复员工作。中央大学复原后，师范学院比抗战前有所发展，学院由徐养秋主持，全院教师85人，教授、副教授36人（兼任4人）。徐养秋担任师范学院院长以来，也较为重视师资对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的重要作用，热心敦请中外学者来院教学授课。例如先后邀请葛瑞华、晏阳初、程伯庐来我院讲学。^[30]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3.2 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征

3.2.1 课程科目“通专平衡，文理兼备”

从南京高师，到中央大学。纵观中央大学教育学科课程设置，一个最明显特征是课程即重视通识课的学习，也坚守专业课的基本。第一，在课程设置方面，“通专平衡”是指课程设置即重视通识性课程也重视专业类课程。既追求知识学习的广度又追求只是学习的深度。从东南大学时期的课程结构可以明显发现学生之必修普通课程皆为通识性课程。从中外语言、到世界形势、既有哲学也有科学，此外也非常重视体育。这也反映出了

郭秉文校长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要“通专平衡”的理念，要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第二，“文理兼备”是指课程内容的学科即涉及文学、哲学、艺术、语言学等文科类学科，也有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化学等理科类学科。

3.2.2 课程质量力求“精益求精”

首先，高质量的课程必要有一批高质量的教师。在郭秉文任东南大学校长期间非常重视师资建设。他认为，一所好的大学，好的师资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为此，他诚心邀请各科名家前来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的教育科更是名师云集，当时在东大教育科的教师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等。在中央大学建设前期，教育学院的教师有郑晓沧、张士一、孟宪承等人。这些学界泰斗和知名学者为学生们提供了门类齐全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

第二，课程设置的高质量还表现在课程的系统化、科学化。一方面，系统化表现在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结构的系统化。学科课程由基础理论类、实践类、方法类、学科交叉类以及学科发展史等部分构成。另一方面，科学化首先表现在教育科学化。将心理学融入教育学之中，遵循教育规律，按科学的理念办学。其次，设置方法类课程。用实证的材料引证经典理论。再者，重视其他学科的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需学习教育学类的课程，还需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以及加强体育锻炼。这正是尊重知识学习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体现。

3.2.3 课程目标追求“重学术轻师范”

首先，升格为综合大学后的国立东南大学与一般的师范学校不同，教育科所培养的人才即包括教师也有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人才。不管是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东南大学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培养学术人才而设置的；例如教育社会学、心理测量、教育统计等方法类和交叉类课程。第二，通识性课程的设置也有利于培养跨学科思维的学术人才，多学科的知识学习有利于拓宽学生们的理论视野和看问题的视角，为日后参加实践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可以说，为培养教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人才也是中央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一大特色。

强国必先强教，建设教育强国，高质量的教师教育是重中之重。高质量的教师教育需要服务于国家、社会的需要，需要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和优质的师资条件。

参考文献

[1]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EB/OL]. (2023-02-22) [2023-08-30]. [http](http://www.xinhuanet.com)

- 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6784803536341798346&item_id=16784803536341798346.
- [2]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EB/OL]. (2023-05-29) [2023-08-30]. http://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226786665364481927&item_id=1226786665364481927.
- [3]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EB/OL]. (2023-07-25) [2023-08-3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4893.htm.
- [4]肖朗, 项建英. 近代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北高师和南高师为中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01): 69-75.
- [5]韩立云. 民国初期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两种模式——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例[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2(04): 44-48+124.
- [6]刘新玲.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制演变的历史回顾与思考[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2(01): 10-16.
- [7]喻永庆. 近代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研究——以东南大学教育科为例[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4, 30(02): 3-11+97.
- [8]张礼永. 高师教育的“朱陈之争”——1942年朱家骅与陈立夫争论师范学院制之探析[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01): 101-106+112.
- [9]刘静. 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D]. 南京大学, 2017.
- [10]王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师改大”运动研究[D].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 [11]孙邦华, 颜芳.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师范大学的生存危机[J]. 北京社会科学, 2011(03): 103-108.
- [12]赵家俊. 北极阁下育师心: 国立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教育学科(1921-1937)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南京大学, 2020.
- [13]王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师改大”运动研究[D].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 [14]刘捷. “高师改大运动”及其现代价值研究[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1(03): 31-35.
- [15]教育公报. 咨江苏省长商请正式委任郭秉文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薪俸应改照规程办理文[N]. 1919. 08. 22.
- [16]时事新报. 郭秉文被任为东南大学校长[N]. 1921. 09. 09.
- [17]王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师改大”运动研究[D].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 [18]时事新报. 杜威教授到京[N]. 1918. 03. 11.
- [19]安徽教育杂志. 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议案[Z]. 1915.
- [20]时事新报. 学校系统改革案已公布[N]. 1922. 11. 05.
- [21]中华教育界. 国立东南大学大纲草案[Z]. 1921. 10: 75-78.
-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23]朱斐主编. 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第2版[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24]王德滋主编.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5]王德滋主编.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6]国立师范学院旬刊. 一年来之教务简况[Z]. 1939. 08: 4.
- [27]王德滋主编.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8]王德滋主编.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9]国立师范学院.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M]. 1939. 08: 02.
- [30]王德滋主编.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作者简介: 王金星(1997.02—)男, 汉族, 安徽亳州人, 助教,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教师教育、教育公平、思想政治教育。
- 作者简介: 王影(1991年9月—), 女, 汉族, 安徽亳州人, 教师, 研究方向: 幼儿教师教育、小学语文教学。